

政府与村民的行为对古村落保护及景观变迁的影响 ——基于本土社会学理论视角

翁时秀^{1,2}, 彭 华²

(1.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为探究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的发生机理及不同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对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进行了案例研究。从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国家正式权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中,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政府与村民的互动推动了古村落景观的变迁。借用“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将变迁中的行动者分为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四类,指出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各不相同又彼此联系的行为逻辑,为常态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提供了一种行动者类型框架和一种理解方式。

关键词: 古村落; 景观变迁; 行动者类型; 行为逻辑; 本土理论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1)03-0372-06

古村落保护是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多门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外的建筑遗产和聚落遗产保护研究多集中于保护技术的探讨^[1~6],也有学者从管理机制角度分析历史城镇保护政策的诸般利弊^[7~10]。村落保护政策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的少量研究指出,如果不符合农村居民的经济理性和实用理性,传统农业住宅的保护政策将难见成效^[11]。与国外不同,国内关于中国古村落保护的研究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对话。他们就物质规划与保护(例如建新村及其限制^[12~14]、土地整理^[15]、旅游规划^[16]等)的作用和局限、古民居产权清晰化的重要性及其限度^[17~19]进行了讨论,或认为另辟新村是保护乡土聚落的最佳的甚至唯一的方案^[12],或强调挖掘空关老宅的潜力是解决人地关系矛盾桎梏的基础^[15],或论证“产权清晰”是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条件^[17,18],或指出对于一个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从而有较强合作能力的社会,忽视甚至剥夺村民主体利益的外部介入性的清晰产权安排不仅不一定起作用,反而可能适得其反^[19]。还有学者则转换视角,指出古村落保护应注重“人”的因素^[20]及村民保护态度的培养^[21,22];另有研究则从各种政策之间的

矛盾^[23]和立法的角度分析古村落保护。一般学者都赞同开发旅游是古村落保护必不可少的途径,但要注意旅游开发的形式^[14,24]。

上述成果对于古村落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却忽视了古村落景观的动态变迁过程及人的行为在其中的作用。从发生学的角度理解古村落景观变迁的过程,从类型的角度划分主要行动者,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各类行动者的行为逻辑,这在实践上将有助于古村落保护政策的制定,在理论上将有助于理解古村落景观变迁的人地互动机制。本研究将从发生学和类型的角度关注如下三个基本问题:①古村落的景观变迁是如何发生的?②参与景观变迁的行动者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③这些行动者的行为逻辑是怎样的?

1 研究方法 & 研究区域

文章采取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叙事访谈、非参与观察及获取文件档案证据等手段收集资料。首次田野调查于2008年1月5日至22日在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进行,调查为期18天,访谈62人次,整理得13万字访谈记录。

收稿日期:2010-07-05; 修订日期:2011-01-25

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40000-3191002)、中山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逸仙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40000-3126201)资助。

作者简介:翁时秀(1984-),男,浙江瑞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学、古村镇旅游与社区旅游方面研究。E-mail: wsxsystu@163.com

2010年8月至11月,笔者再次对江浙两地的古村镇展开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其中楠溪江调研23天),正式访谈200余人次。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笔者最终选取楠溪江古村落群的典型代表芙蓉村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根据访谈和其他文献资料整理出芙蓉村建筑景观变迁史,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行动者类型及其行为逻辑。

中国大多数古村落都难以复制西递、宏村等世界文化遗产级古村落的发展模式,因此,常态中研究古村落景观变迁的一般问题更为重要。楠溪江古村落代表了中国古村落的一般状态,以其为研究对象更有普遍意义。

2 芙蓉村建筑景观变迁

现代砖混结构建筑因其容易建造、可建多层、建材容易购置、建筑更牢固、居住更舒服等优势,对传统乡土建筑的保存产生了极大冲击。这是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的一个基本动因。在此背景下,古村落居民通常倾向于选择砖混建筑。为了保护古村落,政府不得不限制村民建新宅。于是,政府与村民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古村落景观变迁便在这种张力中发生。

芙蓉村的建筑景观变迁典型体现了这一点。当前,芙蓉村存在五种类型的建筑:①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乡土建筑,如司马第大屋、陈氏大宗祠、芙蓉书院等;②1980年代后期至1996年间建的2~3层砖混结构建筑;③1996年之后村民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建设、建成后应政府要求改造外立面的砖混结构建筑;④村民未经政府批准自行搭建的各种单层、低矮而凌乱的建筑;⑤村民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建设、被政府部分拆毁的未建成住宅。

建筑景观混杂的情况始于1980年代后期。当时,永嘉县开始古村落保护,但对古村新宅的管制并不严格。而当时有能力建新宅的村民多为村中“能人”,可以轻易建起砖房。至1990年代中期,村中建成了若干新砖房。与此同时,其他村民对新住宅的需求也逐渐增强。

1996年,楠溪江沿线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发展规划完成,永嘉县加大古村保护力度,加强古村新宅建设管制。随后几年,村民多处于观望状态,但由于居住空间过分狭小(有些村民一户人家十几人同住一座房)、旧房毁损、男性年轻村民结婚分家等原因,村民对新宅的需求在观望中渐增。

尽管政府并非完全禁止古村落兴建新宅,但新宅建设手续繁琐,村民需先行申请,然后政府协助村民进行选址和建筑设计,任何环节稍有问题,建宅手续可能就难以审批通过。尤其是芙蓉村这样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宅手续的办理更是难上加难。因而在现实中,1996年之后,芙蓉村就再没批过一座新宅。

于是,村民开始私下建宅。首先是部分村民通过“关系”兴建新宅,政府对此没有过多追究,但新宅不发给土地证和房产证。由于有“关系”村民的示范效应,无“关系”村民也跟着建宅。对于这些无“关系”村民,镇政府通常不愿强制拆除其新宅。但县政府不同,当事态严重时,县相关部门就会采取捣房行动(即强制拆毁违法违规建筑的局部,但这种拆除通常是不彻底的,拆过之后,村民能够继续修建其房屋)。在芙蓉村,2006年、2008年都曾有大规模捣房行动。

村民一旦遭遇捣房,马上通过上访、破坏旅游设施等危及“稳定”的手段迫使政府让步。为了避免引起不稳定情况发生,同时鉴于相关规定,县政府也无法全部强拆违法新宅。

对于违法新宅,由于无法全部强拆,政府曾试图通过新宅改造来改善古村落的景观,但这些改造在乡土社会中难以贯彻,改造很难达到理想效果。政府于2002年和2006年曾试图对芙蓉村新宅进行改造,但都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除了大刀阔斧的修建与改动之外,更多的是村民对住宅日常的小修小改,增建厨房、卫生间、杂物间或局部修补老建筑等,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古村的面貌。

3 理论分析

3.1 分析框架

上述景观变迁现象需要放到“人地互动”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其关键是分析参与景观变迁的行动者的类型及其行为逻辑。

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分析路线:一是以西方的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或资源动员理论为分析框架进行解读,二是以本土社会学关于“人情”、“面子”和“关系”的理论化成果为指导进行探讨。

有学者倾向于将“人情”和“面子”作为一种关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来探讨它的交换方式,但另有学者则认为,这种附加方式过于

简单,因为中国人运作“关系”的策略和思路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原理有诸多不同,需要加以区分和讨论^[25]。本研究接受后一种观点,认为“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更符合中国乡村的实际,更具解释力。因此,本文在金耀基等学者关于“天理”、“人情”、“面子”、“关系”等理论研究基础上展开芙蓉村的建筑景观变迁分析^[25~29]。

3.2 理论分析

3.2.1 情理社会中的“天理”诉求

“受苦者”对“天理”的诉求是芙蓉村民进行抗争的道德根基。所谓天理,就是天的运作规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是乡土社会的“天理”,在没有居住空间的情况下,建新宅当然合乎“天理”,而政府的捣房行为当然极不合“天理”。基于这种思想,村民认为自己是“受苦者”,而一群“受苦者”对新宅的追求在道德上是无可谴责的。这样,村民在“天理”上就立于不败之地。

3.2.2 有“关系”村民的建宅行为

“天理”为村民建宅提供了道德支撑,但要想建起新宅,还需要“人情”的支持。在保护初期,有“关系”村民便是通过与有权人的“人情”交换实现建宅愿望。

与有权人的“人情”交换可以带来权力的假借。权力的假借不是指权力的移交或传递,也不是指授予他人行使该权力,而是指因为有“人情”交往的存在,便如同相关者(即自身没有权力,但与有权人存在“人情”关系的人)拥有了与有权人几乎相同的权力,让人们在想象的空间和关联逻辑思维中认为,相关者的意愿就是有权人的意愿,或反过来说,得罪了相关者就等于得罪了有权者^[25]。在乡土社会中,总会有某些普通村民与某些有权人存在“人情”关系,而行政人员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则是情理社会的一种常态,因而在古村落中,那些与有权人存在“人情”关系的普通村民便能通过权力的位移实现兴建新宅的愿望。

当然,不能说情理社会中人人如此,但是上述分析符合情理社会的一般逻辑。

3.2.3 政府的捣房逻辑

“人情”逻辑可以解释有“关系”的村民为何能够将新宅建起来,但却无法给出没“关系”的村民也能建起新宅的原因。要解释后者,就需要诉诸乡(镇)、县(市)两级政府捣房的行政逻辑及无“关

系”村民的行为逻辑。

(1) 乡镇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逻辑下通常不采用强制性权力

在乡村社会,国家正式权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中,正式权力的行使需要考虑很多非正式因素。很多乡镇干部由于长期与村民打交道,因而熟谙乡土生活,熟谙乡村中的人情和规则^[30],他们深知,必须使权力的行使过程合乎日常生活中的情理,而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有关权力的正式规定反而是其次^[30]。因此,在芙蓉村,乡镇政府知道,对于村民建房,如果压制得太严,或者过多使用强制性权力,可能会造成不可控的局面。而“稳定压倒一切”是当前中国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行政逻辑^[31],所以,如果上级政府没有非常强硬的命令,而古村落保护和乡镇干部的政绩又没有非常大的关系,乡镇政府并不愿使用强制性权力限制村民建新宅。

(2) 县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逻辑下无法全部强拆违法新宅

拆除违法建筑通常是县里相关部门的任务。县级部门不像乡镇政府那样和农村有着直接的联系,其执法行为不同于乡镇,是使用强制性权力来拆除违法建筑。并不是因为县级部门不考虑行使强制性权力是否合情合理,而是拆违不可避免地需要强制性权力。拆违是政府的程序性工作,也是一种意在示范、威慑的权力技术。在芙蓉村出现了多次县里组织拆违队到村“捣房”的事件。使用强制拆违的行政手段会招致村民的闹事、上访等反抗。鉴于永嘉县古村落众多,村民普遍存在违法建新宅的行为,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行政逻辑的指导下,为防出现局面失控的情况,在捣完新宅之后,政府一般也就默许新宅建完。

3.2.4 无“关系”村民的建宅行为

从当前的情况看,政府的上述行政方式已被村民掌握。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无“关系”村民也相应地制定了对策——不申请便自行建房,任政府“捣”,“捣”完之后马上“闹”,即通过上访、破坏旅游设施等危及“稳定”的手段迫使政府让步,闹完之后继续建,直到建成为止。由此,村民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动地位,只不过这种对策是以经济损失为代价的。

3.3 行动者类型及其行为逻辑对古村落保护和景观变迁的影响

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情境中,古村落景观变迁中

存在四类行动者,即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各不相同又彼此联系的行为逻辑,这些行为逻辑对古村落保护和景观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村民(包括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而言,“居者有其屋”是“天理”,但由于古村落保护,村民建新宅被贴上“破坏者”的标签。村民自身对此并不接受,反而认为自己是“受苦者”,这样,在“理”上,村民就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是一个讲究“人情”、“面子”和“关系”的社会,与有权人的人情交换可以带来权力的位移。在这种情境中,有“关系”的村民为建新宅而动用“人情”和“关系”,通过权力的位移率先建起新宅而免遭拆除。无“关系”的村民开始试探性地违法建新宅。对此,由于中国乡村中国家正式权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内,乡镇政府不愿采用强制性权力限制村民建宅,而县(市)政府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逻辑,也无法全部强拆违法新宅。政府这样的行为方式被村民掌握之后,村民纷纷建起新宅,由此造成了古村落景观变迁,使得古村落保护政策逐渐失效。

4 结论与讨论

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及保护必须置于当前中国的乡村情境才能充分理解。文章以楠溪江古村落的典型代表芙蓉村为例,通过“天理”、“人情”、“面子”、“关系”等本土概念的运用,从发生学和类型学的角度分析了芙蓉村的景观变迁,通过对“人”的分析实现了对“地”(及“地”的变化)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常态下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中的四种行动者: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并归纳出各自的行为逻辑。

这种行动者类型划分的基础是中国乡村研究通常采用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这一框架常常具体化为“政府—村民”关系,而本研究则结合本土理论对“政府”和“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划出四类行动者。这种四分法正好可以理解常态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不至于因为“政府—村民”的简单划分而无法完整理解情境,也不因类型的过分庞杂、琐碎而失去意义。由此,文章为常态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提供了一种行动者类型框架和一种理解方式,可为古村落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文章一再强调“常态”二字,在行动者类型框架中也不涉及游客、学者、媒体等相关行动者,这是因为中国大多数古村落的旅游发展状况和社会关注度都与西递、宏村等作为世界遗产的古村落相去甚远,旅游尚未成为、也很难成为影响大多数古村落居民行为逻辑的作用力,毕竟在一个地区中,能发展成大众旅游地的古村落数量极少而学者、媒体作为外部力量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另外,文章也没有将“另辟新村”的政策手段纳入分析,这是因为笔者在楠溪江的调研发现,另辟新村也难以遏制古村落景观变迁的大趋势、难以改变政府和村民的行为逻辑。

总之,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出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的行动者类型框架,这一框架是对一个小的社会单元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比较材料,以后的研究可以以此为参照,对这一结论进行证实或证伪,以此获得真正科学的结论。

致谢:感谢保继刚教授为本文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1] Cardinale N, Ruggierob F. A case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measures techniques for the conservation in the vernacular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Italy [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02, 37(4): 405–414.
- [2] Elert K, Cultrone G, Navarro C R, et al. Durability of bricks used in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Influence of composition and microstructure [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03, 4(2): 91–99.
- [3] Lazzarini L, Borrelli E, Bouabdelli M, et al. Insight into the conservation problems of the stone building "Bab Agnaou", a XII cent. Monumental gate in Marrakech (Morocco) [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07, 8(3): 315–322.
- [4] Sandrolini F, Franzoni E, Cuppini G, et al. Materials decay and environmental attack in the Pio Palace at Carpi: A holistic approach for historical architectural surfaces conservation [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07, 42(5): 1966–1974.
- [5] Moropoulou A, Polikreti K, Ruf V, et al. San Francisco Monastery, Quito, Ecuador: Characterisa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damage assessment and conservation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03, 4(2): 101–108.
- [6] Rozenbaum O, Barbanson L, Muller F, et al. Significance of a combined approach for replacement stones in the heritage buildings' conservation frame [J]. Comptes Rendus Geosciences, 2008, 340(6): 345–355.

- [7] Strange I. Planning for change, conserving the past: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in historic cities? [J]. *Cities*, 1997, **14**(4): 227–233.
- [8] Pendlebury J.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reas in the UK: A case study of "Grainger Town", Newcastle upon Tyne [J]. *Cities*, 1999, **16**(6): 423–433.
- [9] Yeoh B S A, Huang S. The conservation-redevelopment dilemma in Singapore: The case of the Kampong Glam historic district [J]. *Cities*, 1996, **13**(6): 411–422.
- [10] Lee S L. Urban conservation polic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case of Singapore [J]. *Cities*, 1996, **13**(6): 399–409.
- [11] Ruda 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2): 93–97.
- [12] 陈志华. 由《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引起的话 [J]. *时代建筑*, 2000, (3): 20–23.
- [13] 陈志华. 关于楠溪江古村落保护问题的信 [J]. *建筑学报*, 2001, (11): 52–53.
- [14] 楼庆西. 中国古村落: 困境与生机——乡土建筑的价值及其保护 [J]. *中国文化遗产*, 2007, (2): 10–29.
- [15] 朱晓明. 试论古村落的土地整理问题 [J]. *小城镇建设*, 2000, (5): 52–54.
- [16] 朱桃杏, 陆 林. 传统村镇旅游规划与开发模式探讨——以黟县西递古村落为例 [J]. *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 2007, **20**(1): 88–92.
- [17] 许抄军, 刘沛林, 周晓君. 古村落民居保护与开发的产权分析 [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3, **24**(4): 19–23.
- [18] 姚国荣, 陆 林, 章德辉. 古村落开发与旅游运营机制研究——以安徽省黟县宏村为例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4, (4): 68–70.
- [19] 齐学栋. 古村落与传统民居旅游开发模式刍议 [J]. *学术交流*, 2006, (10): 131–134.
- [20] 朱光亚, 黄 滋. 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J]. *建筑学报*, 1999, (4): 56–57.
- [21] 郑土有. “自鄙”、“自珍”与“自毁”——关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7, (2): 135–137.
- [22] 许重岗. 建立古村落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思考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3, (3): 149–152.
- [23] 车震宇, 保继刚. 市县政策与管理在古村落保护和旅游中的重要性——以黄山市、大理州和丽江市为例 [J]. *建筑学报*, 2006, (12): 45–47.
- [24] 吴承照, 肖建莉. 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策略——以高迁古村落为例 [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 (4): 56–60.
- [25]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62–171.
- [26] 金耀基. 人际关系中的人情之分析 [C] // 杨国枢. *中国人的心理*.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1988: 75–104.
- [27] Ho D Y – F. On the concept of face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81**(4): 867–884.
- [28] 黄光国. 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39, 63–87.
- [29] Hu H C.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4, **46**(1): 45–64.
- [30] 孙立平, 郭于华. “软硬兼施”: 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 B 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 [C]. //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0: 21–46.
- [31] 吴 毅. “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7, **22**(5): 21–45.

Impact of Behaviors of Governments and Villagers on Ancient Villages Protection and Landscape Changing: A Perspective of Native Sociological Theory

WENG Shi-Xiu^{1,2}, PENG Hua²

(1.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2. 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To discover how ancient villages landscape changing and how to classify actors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and to find out the logic behind actors' behavio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Furong Village, an ancient village at Nanxi River Basin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native sociological theories a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landscape changing. By these,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in China, the rural society is a Qingli society (reasonableness society), and Tianli (reason and morality), Renqing

(favor), Mianzi (face) are very important. The formal power is embedded in rural cultur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power,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villagers, caused the landscape changing. Borrow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 and society', actors in landscape changing are divided into four styles: the governors of counties, the governors of towns, the villagers who having Guanxi, and the villagers who have no Guanxi.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protecting policy, villagers think themselves as 'martyr', as the people who cannot achieve enough residential space, thus they occupied the highland of Tianli. By the displacement of power, the villagers who having Guanxi can 'borrow' power from the person who are more powerful, thus they can build up their new houses. The behavior of the villagers who have Guanxi influenced the villagers without Guanxi, who also try to build new houses, under the case that the governments restrict them, they can say "Other people can build up their new houses, why we can't?" They also can take use of the governors' weakness such as destroying the tourist facilities, collective petitions and so on to make confusion and force the governments to concess. And for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oral image and the identity from villagers, the governors of towns donnot want to use violence, and in order to keep stabilization, the governors of counties cannot tear down all the outlawed buildings. Once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governments are found out by villagers, many villagers can build up their new houses. Thus, the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policy did not work. Thus, this paper induced four types of actors in the ancient villages' landscape changing, and each types of actors' behavior logic are portrayed. Based on 'nation and society' binary framework,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Actor Typology' and a way of understanding to research Chinese ancient villages' landscape changing under normal state, which can help policy-makers to design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policy. In this typology, stakeholders such as tourists, scholars and media are not included, because in most Chinese ancient villages, tourism has not become to be, and very hard to become to be, the important influent factor of landscape changing. Also, in this typology, policies such as 'build new residential areas' are not considered, because the authors found out that, such policies are hard to restrict the tendency of landscape changing and hard to change actors' behavior logic. I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simple, the best', this typology eliminate other types of actors, only include four types of actor, and it can just explain how the ancient villages' landscape changing happens.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 landscape changing; actors typology; act logic; native theory